

再生凤凰
韩素音
立日自秀



韩素音 著
庄绎传 杨适华 译

再生凤凰

615.6
098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

——再生凤凰

韩素音 著
庄绎传 译
杨适华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素音自传: 再生凤凰 / (英) 韩素音著; 庄绎传, 杨适华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1 (1994.12 重印)

ISBN 7-80074-528-7

I. 韩… II. ①韩… ②庄… ③杨… III. 韩素音-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5466 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再生凤凰
韩素音 著
庄绎传 杨适华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国家建材局情报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 224 千字 10 印张

版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528-7/I·240

定价 9.10 元

序

韩素青 Han Suqing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幸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的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蕴育了文化。

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及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增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产物，又造就了我们社会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感其相互的汇合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关连到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初次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

“个人”，使历史知识易于被人接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人，我在历史发展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它的一线牵连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浮沉在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巨浪时起时伏，我们既是它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今天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又可作为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指导过生活的事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和意识到的一部分，构成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使我们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自我孤立于大地上其他国家及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若干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索对于他们各自生活的意义。

(冯亦代 译)

1966—1979



第一章

乌云密布

——“文化大革命”(1966)

1966年1月我到北京去，在那里逗留了十天，因为我将应邀参加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有关中国的研讨会。那年至少有五个这样的会议要在美国中西部大城市召开。我打算了解一下北京有什么新的思想动向。

我的笔记本里记满了与各界人士会见时所谈到的中国的各项政策和经济方面的情况，把我完全弄糊涂了。我见不到周恩来，那时我不了解极为激烈的斗争正在最高级领导人之间，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着。因此领导人都不出来接见，即使接见，也不提供确切的情况。我只能依据周总理说的两句话，他说：“美国迟早总得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外政策，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他还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是大动荡，大改组，大倒退的时代。美国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考虑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谈更多的情况。

龚澎和曾在美国受教育的唐明照*，对美国新近犹豫不决的状况感到关切，很想了解研讨会的结果如何。唐明照说：“要放长线才能钓大鱼……”龚澎说：“美国新闻界好像权力很大……，确实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她还说：“树木是不能在光秃秃的石头上生长的。”

毛主席在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态度是不明朗的。我没有机会了解当时在党内所进行的激烈斗争；那是绝对秘密进行的，无迹可寻。华兰的级别还不够高，不了解情况，只是说“在文学艺术和教育界”会再来一次政治运动，这种形式在中国是习以为常的。

华兰的妹妹从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及“四清”回来。她的皮肤变粗了，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指关节也肿了。她说：“当时我的工作清除了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没有时间画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工作组“下去”搞这项工作。她盼着能再去教书和画画，“不过眼下我们有很多毛泽东思想政治学习班”。她还说：“我们正在向军队学习呢。”华兰充满了激情。她说：“我们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这是十分重要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已经上演。早在1944年在延安时就上演过（音乐受柴可夫斯基的影响很大）。“我们的工农兵不喜欢西方芭蕾舞，因为他们看不懂。他们喜欢《白毛女》这样的芭蕾舞和歌剧，因为这样的戏和他们息息相通。”有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年轻人，让他扮演《天鹅湖》里王子的角色，他却拒绝演这个角色：他认为扮演王子的角色

* 唐明照后来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

** 参看斯诺的文章《会见毛泽东》，载于1965年2月27日《新共和》周刊。

会给他们家“丢脸”……华兰说：“舞蹈演员们只有在去过农村之后，才能在我们新的歌剧、舞剧里表现出真实的感情”。

在作家之间悄悄地传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剧本受到了批判。1965年，上海一位文艺评论者姚文元写了长篇文章，严厉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在1957年姚文元就对右派分子进行过严厉的谴责。海瑞是明朝(1368—1644)一位清官，曾经指责皇帝不听取人民的意见。现在谣传在1960年初次上演的这部“历史剧”是用来给前国防部长彭德怀翻案的。彭德怀在1959年8月曾公开批评过“大跃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的总编辑严文井请朋友们一起吃饭，席间他问我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什么看法。我如实说没有看过这出戏。用历史题材和关于古人的文章来反映当代的情况、事件和个人，中国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现在还会继续这样做。但是这时候不仅副市长吴晗，还有很多其他的历史学家都在受批判，说他们“在推行资产阶级路线”。

在中国居住的一位外国人告诉我，目前正在批判《前线》月刊(北京市委的杂志)总编辑邓拓。邓拓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应有一些闲暇时间，只应该工作八小时。”这位外国人说：“闲暇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互不相容的。”工厂里的年轻人都染上了不断看钟点的习惯。

1月份不仅冷气袭人，而且人们内心充满恐惧，到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理论方面的争论。我会见了三位哲学家，他们向我介绍了最新的“思想”。(我没想到“思想”这个词竟会把我引入抽象地探讨理论的高深境界。)这三位哲学家谈到了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只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才能前进。在物质生活状况改

变之前是有可能改变思想、习惯和行为的。但是，人类在思想方面能够超越自我而飞跃吗？能够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而飞跃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飞机发明之前，人们不是就曾梦想过飞行器吗？一切进步都来源于思想，而思想总是走在有形的物质刺激的前面。这几位哲学家还说，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的学说，是“修正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

我更加感到糊涂了。我怎么能把这个拿到美国的研讨会上去讲呢？于是我就说起了我最喜欢谈的话题来。我说：“语言影响思想；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既然有赖于词句，肯定总是不准确的，只是近似而已。我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汉字的形状就是以封建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人一向爱考虑传统、等级、资历，一切按部就班，这与汉字的形状有很大的关系。”“同志们在你谈毛泽东思想呢”，邢绛有点严厉地对我说，提醒我不要说蠢话。我向这几位哲学家表示感谢，然后就告辞了。我去买了几个很漂亮的玛瑙和玉制的鼻烟壶，当时这些东西很便宜。看着这些鼻烟壶，有助于消除我的思想混乱。

芝加哥大学成人教育中心校舍颇为壮观，但是必须经过阴暗的黑人贫民窟才能进来。肮脏的积雪和垃圾混在一起，堆在无人居住的木板房的墙跟下面。美国黑人走在街上，穿得很单薄。他们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怎能忍受得住这样的严寒？

研讨会的日期是2月8日至12日。我见到《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感到很高兴。由于有共同的感受，我们建立了珍贵的友谊。会议的组织者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发表。参加会议的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琼·鲁宾逊，有瑞典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家简·迈德尔,还有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路易斯和弗朗兹·舒尔曼。也有几个鹰派人物,例如马克·盖恩和莫顿·霍尔珀林。我告诉舒尔曼,我十分欣赏他的那本书《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我和他坐在一起,这是因为排座位的人没有注意,把我的名字按S排列,而没有按H排列。)《原子能科学家通讯》编辑鲁思·亚当斯约我写一篇文章。我觉得我为研讨会做的贡献不大,不过我从中却学到了很多:美国政府内外的力量都在促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西海岸的商人,甚至中西部城市的商人都强烈要求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活动很多:报告会,在电视上露面,各种的会议……我和西德尼·蓉梅以及我那个1965年11月出生的孙女卡伦一起在纽约感到很高兴。见到那些思想敏捷、博学多才、不愿出头露面的美国学者,和他们有共同的想法我感到很愉快,他们易于接近,很少夸夸其谈。而那些更有名气的“专家”之中,有几个我觉得似乎给他们的评价太高了。任何地方不也都是这个样子吗?文字夸张比清醒的头脑更能提高一个人的声誉……到1966年6月,由于美国学者极力争取,《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修正对华政策势在必行。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老板斯派洛·斯库洛斯请我们吃饭。派拉蒙影片公司想把《青山青》拍成电影,试过几次,遇到了困难,这时已经很清楚了。1959年,派拉蒙派了一个小组去新加坡。埃德·德米瑞克是未来的导演,由他带队,随行的有他的夫人和编剧鲍勃·阿瑟。在离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德米瑞克服用了抗生素,由于他过于谨慎,肠胃可遭了殃。他的夫人受到异国文化冲击,也感到很痛苦,因为在到达新加坡时正好赶上Thaipusam节,这是

一项很可怕的活动。看到人们用匕首刺进自己的双颊、双臂和双腿（不出血），在燃烧的炭火上行走，或将 Kavadis 压在身上；用鲜花和金银丝编成的大花环缠在铁蒺藜上，挂在肋条骨上或后背上。看到这一切，德米瑞克夫人是受不了的。

他们三个人从新加坡来到尼泊尔，又碰上一次文化冲击。人们正在举行难近母祭，难近母是一位血腥的女神，廓尔喀人正把成排的公牛献给女神。这是一次隆重的外交活动。驻在加德满都的大使们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派拉蒙一行也在场。牛都排成行，一名廓尔喀人走上前来，紧紧握着他那沉重的、磨得飞快的刀，跑着跳起来，一下子把牛头砍下来，大量的血喷向空中，廓尔喀人赞赏地喊叫起来，德米瑞克夫人却昏了过去。派拉蒙这个小组第二天就离开了尼泊尔。我不知道斯库洛斯是否知道这段故事。他说：“我们本来是会把你那本书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的。”说不定他的话是对的。

我接着到了巴黎，去会见安德烈·马尔罗，他是《人类的命运》的著名作者，是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

安德烈·马尔罗在他那空气流通的豪华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或者说是他说了两个小时，我说话不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亨利·海尔事后告诉我，马尔罗那次和我见面很高兴。马尔罗确曾邀请我再来，并且说他要到凡尔赛宫请我吃午饭，还说要让我给政府机关里的人讲话。他说：“你的书使人对中国感到亲切，对中国有所了解。”他对于自己所做的卓越贡献是很谦虚的。1964年他见到了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精力充沛，身体很好，说“他对世界有全局看法，而这种人是为数不多的”。他把斯大林和毛主席做了对比，人们出自恐惧心理对斯大林表示尊敬。人们

出自对权威的崇拜而尊敬毛主席。马尔罗曾对毛主席说：“斯大林恨你，曾想把你杀死。”毛主席抽着烟，平静地说：“是的，斯大林是想这样干的。”

马尔罗还谈到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马尔罗曾见过肯尼迪总统。他说：“肯尼迪长篇大套地谈论阻止中国侵略印度。我提醒肯尼迪，让他注意将来美国的梦想和亚洲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表面化以后会出现的危险。失败——美国是难以接受的。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他预见到美国在越南是要失败的。

马尔罗无所不谈，有时笑笑，有时打打手势，谈笑风生，令人折服。我听得入神。“比北京国庆节的烟火还精采。”马尔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喜欢周恩来。只有毛泽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一切伟人都是这样”。他对于中国的翻译及陪同人员的极端无知感到痛惜。他说：“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知道我曾在二十年代来过中国……在广州，我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指给他们看我和中国革命者一起拍的照片。这是谁？”我指着照片上的我问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

后来我到了伦敦。《残树》及《凡花》在那里反应都很好。第三本书《寂夏》即将完成。我作报告，会见了很多人。我们开车去威尔士，去拜会伯特兰·罗素。他是一位身材瘦小，充满活力，显得年轻的老人。他乐观、诚恳，长着满头漂亮的白发。

“中国为什么不放弃原子弹，单方面裁军，从而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榜样呢？”他问。

“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光靠良好的愿望呀，”我回答说。

“我一想到核灾难，就睡不着觉，”罗素说，由于极度痛苦，他那

微弱而急切的声音就颤抖。

我又到了印度。我去拜会英迪拉·甘地，简单的办法是给秘书处打电话，找她的助手。她的助手奈特瓦·辛格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1956年就见过面。英迪拉很引人注目，办公室的工作并没有影响她的风度。她笑着说：“我没什么变化。”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了边界问题，还谈到了那年在印度发生的灾荒，以及印度富饶的资源 and 巨大的潜力。她说，“我们并不想与中国为敌。”不过她对北京所搞的对巴基斯坦有利的“不恰当的”宣传感到不安（因为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过战争）。她说：“印度不需要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却使得印度始终处在紧张局势中。“这个问题我们非得解决不可”。

1966年5月我又回到中国。那年的5月，中国的情况可不同寻常。扩音器里使人讨厌的沙哑的吵闹声，一连几个钟头，震得我两耳欲聋……这永不休止的噪音，有喊声，有叫声，有歌声，有闹声，怎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所有的标语口号全都换了。愤怒的年轻人挥拳砸烂牛鬼蛇神（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魁梧而脸色红润的毛主席肖像到处都是。在这刺耳的噪音之中，海关人员倒还保持镇静，而且有礼貌，显得很轻松的样子。

火车站不供应午餐；服务员在开政治性的会议。我看见她们在毛主席画像前练习跳舞。她们在胸前抬起双手，表示她们的心向着微笑的毛主席。我听听广播喇叭，可是太多了，声音互相干扰，哇啦哇啦没法听。

在香港，国民党报纸预言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将发生一场冲突。已经有谣言说有人阴谋暗杀毛主席。到处都在谈论一条“黑

线”，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十七年以来这条黑线影响、危害、背离、曲解、歪曲了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工作。我内心深处在呻吟：“看来知识分子又要倒霉了。”当然，我还是在微笑，我尽量克制自己。希望我的家庭不要遭到太多的苦难——也希望我自己不会垮掉。

在广州，1965年时裁剪得很好的衣服看不到了。所有和我接触的人都穿着皱皱巴巴的衬衣，肥肥大大的裤子和塑料凉鞋。男人们的头发都不用发腊，女干部都剪短发，没有人烫发了。

不过在北京，可爱的邢绛仍然穿着挺括的衬衣和裙子。7月份，有一天，龚澎悄悄地对她说：“你的衣服有点资产阶级的味道。”她这样提醒她，也是出自好意。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次动乱是针对刘少奇的。事实上我曾看到过他两次。他还露面，发表讲话，接见客人，新华社还报道他在7月出面主持的支持越南的群众大会。可是，在1970年毛主席告诉斯诺说，1965年1月他就已经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到东北去。”邢绛说。我们于6月份又回到北京。

东北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辽阔的大地，晴朗的蓝天，一片寂静，听不到一点回声。在这样的土地上，你真想骑上马，让马蹄声冲破沉寂，产生出音乐来。

我在沈阳、长春、抚顺、鞍山以及哈尔滨参观了工厂，公社；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露天煤矿（19年前，1947年我的丈夫曹保黄就是在这里去世的）。我记了很多笔记，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情况。在每个工厂里，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挂在机

器和机器之间拉的绳子上，好像旗子一样随风飘扬，几乎挂满了所有的车间。这些大字报对“黑线人物”和“牛鬼蛇神”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早在5月8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批判“反党黑线”。大字报叫嚷：“所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职位多高，多么有名，都必须打倒。”广播喇叭说：“打倒十七年反党黑线。”有的时候，我也能听出一些人的名字，专家的名字，工程师的名字，厂长的名字，不甚出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大学里教育家的名字。不过很明显，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一切，“指挥并领导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因此，抓“牛鬼蛇神”还只是在技术专家、教授和工程师等中层人士间进行。当时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名字一个也没有提。已经提到的最高层的也就是市委书记和一些大学校长。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接见了，我，并且非常阔气地招待我。我吃了熊掌，这是一道昂贵的菜。他们还送给我一枝名贵的人参，价值几千元。回到北京后，我就把它送给万春了。

我看批判性的社论、标语，听广播，几天之后，我的脑袋就发昏了。甚至被那些诅咒人的话弄得麻木了。我微笑、点头，因为老听那些话，我说话也像周围的人一样了。我变得特别驯服，就这一点来说，我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这时，我已经习惯于看那些贴在机器上的大字报，而且都看腻了。大字报上写道：“宋其明在螺丝三车间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王阿蒙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说：政治空话说得太多，科学工作做得太少。”我不认识宋其明，也不认识王阿蒙，我只希望不要把他们搞得那么惨。

在沈阳机床厂，我见到一位工人，他全靠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刀刃上，成了刃具专家。几乎在每个工厂，人们都告诉我俄国人造